

专访制片人常子凌： 创新应建立在成熟的基础之上

■文/本报记者 赵丽



于9月上映的《野孩子》取得了2.4亿元票房，并成为今年中秋档票房冠军。此外还有于暑期档上映的电影《逆鳞》也取得了1.75亿的票房，这也让其背后的出品公司宸铭传媒浮出水面。梳理发现，诸如《涉过愤怒的海》《燃野少年的天空》等影片背后都有宸铭传媒的身影。

作为宸铭传媒创始合伙人、电影制片人、出品人，常子凌近日接受记者专访表示：“我们投资的影片无论是现实题材影片，还是其它类型题材的影片，都是从故事适合哪个类型出发考虑，从现实中汲取灵感，从而引发观众共鸣。”

对于一个公司或者制片人来说，如何才能持续发现好的项目、生产出好的作品？在常子凌看来，产出好的作品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是与优秀的创作者合作，人才本身就代表了最好的项目；第二就是要有敏锐的眼光，这个眼光可以针对题材，也针对人和社会。

坚守初心深耕精品力作

谈及电影，常子凌的回答里都会时刻强调“内容”，无论是剧本的选择，还是IP的打造，还是市场的把握，乃至中国故事的讲述，她认为基石都是“以优质内容为核心”。对中国电影这样本质的认识，让常子凌以及她所在的宸铭传媒都在电影生态中有着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发展。

从《燃野少年的天空》《涉过愤怒的海》到《野孩子》，宸铭传媒一直保持着敏锐的嗅觉。

宸铭传媒的作品以故事性强、关注现实题材而广受好评。众所周知，影视作品是时代的镜子，只有反映现实、触动人心的作品，才能真正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深入挖掘现实生活中的素材，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精彩的情节铺陈，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现实。

常子凌作为制片人参与过《涉过愤怒的海》《最好的相遇》等影片，均涉及到伦理、具有心智障碍的社会特殊群体等严肃社会议题的关注。在她看来：“我们从题材选择的大方向提出四个字——安身立命，这是中国人精神层面特有的永恒追求。无论选择什么题材，都是从观众的心理出发的，我们可以做的议题有很多，重点是怎么选择题材，关注什么样的社会情绪，以及从剧本到主创如何执行出来。”

专访制片人常子凌：

创新应建立在成熟的基础之上

在选片过程中，宸铭传媒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敏锐的眼光。他们犹如一位经验丰富的猎手，在众多的项目信息中，精准地捕捉到那些具有潜力的题材。通过与主流公司及创作者的紧密合作，从而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资源网络，并能够获取到最优质的项目资源。

常子凌透露，她会依据公司的判断和市场需求，对项目进行精心筛选。她深知：“只有符合市场趋势和观众口味的作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他们在选片时，不仅注重题材的新颖性和创新性，更关注作品的“质量和潜力”。

而在融资方面，宸铭传媒以主投主控为主，常子凌表示，公司会凭借对项目的准确判断和前期的充分准备，这也吸引了主流电影公司的合作。“我们的融资过程相对较为顺畅”，当然这得益于常子凌及其团队在项目评估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出色能力。

她说，我们公司目前项目投资主要有四个方向。一是具备未来持续IP开发能力的项目，抵御一部分不确定性；二是具备创新能力且能够与观众深度共鸣的大商业类型片，然后适配大导演、知名演员、大题材，成为头部商业类型片；三是创新且卖点明确、有趣的电影项目，从现实情绪出发但又能够提出新意。我们试图做创新的、有趣的内容，这是公司从早期题材选择就开始定下的基础；四是围绕作者匹配项目。

创新应建立在成熟的基础之上

为了持续挖掘优秀项目并创作出高质量作品，宸铭传媒注重与优秀创作者的合作，并培养敏锐的眼光。

常子凌深知，人才是创作的核心，只有与优秀的创作者携手合作，才能创作出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她认为，产出好作品一是要与优秀的创作者合作，二是要有敏锐的眼光。因此，他们积极与国内外的优秀导演、编剧、演员等合作，共同打造出一部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在创新方面，常子凌认为创新应建立在成熟的基础之上，比如由宸铭传媒投资的《野孩子》“聚焦弱势群体”，改编自真人真事，哥哥马亮和弟弟轩轩靠近彼此，成为一对没有血缘、胜似亲人的“流浪兄弟”，这样的现实题材具有天然的话题度，该片也获得观众认可，斩获了2.41亿票房。此外，《涉过愤怒的海》延续了曹保平导演一如既往的创作理念，极致的类型化讲述与鲜明的作者态度构建了丰富多层的意义空间。该片不仅收获了5.49亿票房，还获得了第19届长春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在常子凌看来，“创新有同步层面的创新，题材的创新、叙事层面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创意的创新，但我们要理解，创新首先来源于成熟之后，完成类型、叙事、技术、创意产出的成熟掌控，才能进行更好的创新，否则创新只能停留在模仿。”

常子凌认为国内电影的创新往往有“两极”，需要成熟的大导演去完成工业上技术上的创新，他们有能力接受风险；另一极则是，叙事与题材的创新则需要更年轻的导演去实现，因为年轻导演可以赋予影片更多想象力、脱离传统的束缚，他们也更加了解目前新观众的需求、阅读的习惯、节奏的习惯；创新的前提是观众感兴趣的好题材、好故事、共鸣情绪为前提的。

她呼吁成熟的大导演进行工业技术创新，同时也支持年轻导演在叙事和题材上大胆创新，以满足新观众的需求。她深知，创新是影视行业发展的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常子凌表示，未来，宸铭传媒将继续专注于开发现实题材下的强情节类型片项目。他们将通过精彩的富有创意的类型故事，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也将不断探索新的创作形式和技术手段，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视听体验。

导演柯汶利的叙事策略与风格

——《默杀》创作访谈

■文/张晓丽

2024年电影暑期档，导演柯汶利的第二部长篇电影《默杀》在中国院线斩获约13.5亿元的票房，超越了他的前作《误杀》13.33亿元的票房佳绩，两部大片作品在口碑评分上也表现亮眼，自编自导的原创电影《默杀》更是在叙事策略及社会议题上备受关注，这位出生在马来西亚祖籍福建的85后青年导演为何能在近几年中国商业类型电影市场中走出多赢的局面？本文通过对柯汶利的特邀专访，一同解构分析属于他的创作密码。

一、缘起与养成：

早在中学时期柯汶利就与戏剧结缘，在当地的戏剧团里出演角色及参与剧本写作，“十二岁时开始接触舞台剧就很喜欢，觉得讲故事很有趣，中学毕业后有机会去到广告公司工作，拍广告实际上也是结合了戏剧：演戏、剧本故事、构图，尤其是故事。”在兴趣和机缘使然下，柯汶利在舞台剧及广告短片领域开启了与戏剧的接触，随后他来到台湾进入到科班院校接受更为系统的教育学习，“在台北的世新大学四年间完成了口传系、公管系两个专业主修和广电系一个专业辅修，这些课程的学习就包含了一些短片影像的制作。大四毕业时我去考了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硕士班，考上之后就一路就开始电影学习，跟着像王童、焦雄屏等台湾导演或电影工作者老师们学习，随后开始独立创作短片，第一部短片就叫《自由人》。”短片《自由人》2015年在奥斯卡“最佳实景短片奖”获得提名，彼时30岁的柯汶利正式由国际电影节展的荣耀获得了电影界的关注，也由此迎来了在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创作机会。而在这一亮相前，他个人的戏剧养成图谱里已经种下了演员、剪辑、剪辑、导演等多种核心工种的多面锻炼，这样的多面锻炼，也为他后来在长片电影的创作中提供了重要作用。

二、类型与题材：

《默杀》是柯汶利编剧导演的原创作品，在谋杀迷案的外壳下，校园霸凌、原生家庭伤害、未成年人犯罪、职场权谋等多个议题层层关联。“有时候沉默是会杀人的，你看什么也没做，但恰恰就因为你没有做什么，可能会让无辜的人受伤。我希望通过《默杀》鼓励更多人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能伸出援手，不再沉默。”与柯汶利的其他作品一样，《默杀》不仅仅意在打造犯罪悬疑片的风格视听，更是力图打造具有深刻社会反思意义的作品。

作品的成功让市场给柯汶利打上了商业类型片导演的标签，对于柯汶利来说，类型的适配其实是在故事内核确定之后的选择。《默杀》的故事灵感同样来自于导演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观察和体悟，当不公的事情发生时，施害者固然可恨，但冷眼旁观者更令人心寒，对柯汶利而言，对作品类型和题材的选择，关联到他最初选择做电影的初衷。“希望通过电影作品的形式为更多人发声，为社会传递正能量，这是我当导演的初衷。我自己对社会议题非常感兴趣，从小到大会常看新闻，看到一些比较不公的事情，就自然很关注。社会事件与悬疑犯罪的类型是比较搭、比较好的组合。我们在拍《误杀》的时候没有想过票房能有这样的成绩，后来看到这个类型的‘天花板’似乎可以不断突破，也就自然继续在这个类型上去创作和发力。”

三、叙事节奏与情绪：

在针对《默杀》剧情节的节奏评论中“反转反转再反转”是高频影评，电影一开始就通过紧张紧凑的情节设置，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悬疑信息的世界，随着剧情的推进，信息点又层层加码，不断揭开的新角度与事件呈现了多层次效果。“我可能希望节奏上可能快一点。110多分钟的电影里，他们不要拿起手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专注。”对当下观众关注力的判断，使得《默杀》让影片呈现出了比之前的作品更为紧凑的叙事节奏，而剪辑思路的前置更让作品被赋予了

饱满的叙事信息：“剪辑在一般的流程里是最后一关，在剪辑线上可以去判断演员的表演，美术需不需要再加特效，镜头可以怎么用，运用在哪里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但剪辑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影响到最终的审美判断。

“当然对于犯罪悬疑题材而言，反转作为一个技巧会被更多地用到，但我个人认为这其中一样要讲求力道，也就是关键在于反转的点能否真正‘击中’观众的内心。《默杀》里的反转更多的是人物人性不同面向的呈现。”面对“反转”这一犯罪悬疑题材的常用技巧，柯汶利希望所有表达技巧所能达到的不是炫技而是最终形成一个情感情绪共鸣：震撼但温暖。

四、人物与关系：

确定了电影的主题后，柯汶利便开始细化人物的编剧创作，《默杀》中的人物是一幅众生相，因社会及家庭关系关联牵绊，总体是为了服务主题而存在，角色用各自的角度阐释着“沉默”这一主题，从校长的权威压制到老师的冷漠旁观，再到母亲的无力保护，每个角色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沉默的含义。但在看似亲密的人物中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冲突，从而完成紧密却又对照鲜明的关系图谱。

“每一个电影都在辩证一个主题。《默杀》是关于‘沉默杀人’的主题，我就需要用两个角色上去辩证这个主题，一方面的角色是赞成沉默的，另一方面角色是赞成发声的。《默杀》里李涵跟小彤就是一组对照关系。李涵是一个比较封建的母亲，什么事情都沉默隐忍，看到年幼的女儿被侵犯发生了惨案，她选择把门关上，把土盖上。但是她的女儿小彤不一样，小彤看见继父伤害母亲和伤害自己的时候，她拿出刀来想要自卫防身，再来面对惠君受伤的时候，她第一时间也是要冲过去救人。李涵和小彤就是一个反对照组。”

编剧兼导演的身份赋予了柯汶利在拍摄时更多的创作空间，在演员刻画人物的表演上，柯汶利更倾向把表演空间提供给演员，让演员可以提前进入片场环境走戏，结合空间氛围自行新增台词和动作。“李涵帮女儿剪头发那场戏，演员也问我说这场戏要怎么拍？我说你按你的感觉来，以你的感受为主，但主要的点就是你该做的动作就是剪头发，然后帮女儿擦掉脸上的胶。然后我就让摄影师也不排练，直接开拍，我偷偷让工作人员在拍摄时放电影的主题曲作为背景音乐，音乐起来氛围特别好，演员进入得很快，尤其是最后那个母女之间要分离的时候，她们现场抱在了一起，那个姿势是我没有设计好，但现场这个画面是很有力量的，在这个动作里看得出女儿想要保护妈妈而且懂妈妈，她为妈妈在考虑，想要让妈妈解脱，这是演员在那个情境里被调动后主动赋予的。”

五、象征与隐喻：

在柯汶利导演的影像表达中，特别重视象征与隐喻的表达。电影《默杀》里设置了多个别具深意且反复出现的意象符号。

白鸽：寓意自由与方向。现实里的鸽子可以飞翔在蓝天也可以被囿于牢笼，影片中它撞击在迷雾四起的校园玻璃上，它出现在美好友谊的好友怀里，它出现在残酷霸凌的压迫里，它还出现在父女相见的梦境里，反复出现的白鸽在不同的阶段带来不同的意义，但最终与希望与救赎的力量，为影片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

金桔：寓意苦涩与坚韧。因为掩盖真相而种在天台的金桔，扎根于被家暴的苦涩，扎根于无所依靠的逆境，扎根于腐烂变质的人体，扎根于职场欺凌的无奈，在苦涩中裹挟着为母则刚的坚韧，沉默结出的“恶果”，给影片赋予了复杂的人性滋味。

锤子：寓意反抗与打破。锤子是凶杀现场的关键凶器，锤子在信徒书中被这样描写：“真理是一把锤子，可以砸碎顽石”，影片里锤子承载了案件的线索也承载着绝望的父亲对复仇的决心，最终以一种捶打叩问的状

态敲击观众的思想……

采访中，柯汶利也表达了自己对象征与隐喻手法的偏爱：“我喜欢电影里有一些动物，因为动物其实不大可控，它的行为动作是非人类逻辑的。我也喜欢用天气去说故事，例如在《默杀》会看到故事发生时多数都在下雨天，后面尘埃落定，雨停了阳光普照。我自己比较喜欢有一些隐喻，有一些帮助理解故事背景气氛的表达。”柯汶利透过象征与隐喻的表达，增强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为观众观影后展开影评评论提供了抓手，从而也成功焕发出影片市场票房号召力，实现艺术与市场的融合。

前作《误杀》作为翻拍作品上映后收获的市场成功，使其成为业界讨论和评析的热门样本，对其成功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改编讨论尤其集中。访谈中，被问到是否在创作时特别针对中国市场文化语境去设定意象表达时，柯汶利则表示渴望对话的是世界的观众，与中国市场的契合更多是自己华语成长背景的自然解读。

“我对话的不只中国观众，应该是世界的观众。这次《默杀》也同步在其他国家上映，在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票房也都不错。对于这样一个节奏，这样一个主题，和不同国家的观众都挺适配的，大家能理解和接受这些表达。在《误杀》中我改编时将原作的‘狗’变为了‘羊’，是因为想把主题进行更好地改编升华，改编后的主题是‘乌合之众’，英文里是‘sheep without a shepherd’，那么刚好和‘羊’关联上，它是一个为了主题升华而改编的设置，并不是从某个国家电影市场语境而倒推去改变的元素。”

六、流动身份与风格定位：

从剪辑到编剧到导演，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大陆，柯汶利在电影创作中的成长是身份流动的过程，而这一次《默杀》的取景地回到了柯汶利的故乡槟城，这似乎是一种回归，但更是一种带着陌生感的挑战。“第一次回自己家乡拍摄，当地的影视制作环境我恰恰是不熟悉的，我们的团队又来自四面八方，需要协调团队内部和当地的配合，是个挺大的挑战。”选择家乡的原因不止于情感，而是马来西亚天然的地域属性与影片设定背景非常一致。“我的父亲是从福建来到马来西亚的木商，从小我就看着他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默杀》这个故事里也是不同背景的人，里面有中国内地的、港台的、马来西亚的等等，所以我们的演员他们带着不一样的口音出现时是不突兀的，使得整个故事语境是贴近地域真实，但故事的理解又是国际开放的。”

故乡包容开放的气质伴随着流动身份的成长过程，似乎也注入了柯汶利的创作风格中。“小时候跟着父亲经常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长大以后去了不同城市工作，我似乎也都能接受大家的想法、属性、习惯，再到后来要做一个电影的时候，就天然地想把身边感受到的不同的文化或者说不同的人组在一起。导演的风格源于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在创作时的审美偏好和叙事方式，它们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不是刻意为之，我觉得风格这种评价应该是外界给予的，说实话我自己很难自我定义，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我喜欢和多元的人交流，非常愿意听取不同的人的建议和看法，拍摄时工作人员包括灯光、场务等，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过来和我交流。所以‘包容度’可能是我比较看重的。”

两部电影的成功已经让柯汶利在世界青年电影导演中备受瞩目，谈及第三部电影柯汶利表示还没具体想法，但未来依旧会在中国电影市场长期深度发展。“中国的市场真的很大，市场大就有很多可以创作的机会，而且这里的电影条件会越来越好的，这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是很好的。下一个作品的类型和题材我现在还不确定，不过无论如何，对于人本身在不同境遇条件下的不同状态，对于这其中的‘为什么’，或许永远将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作者系 CCTV6 电影频道主持人)